

“小先生制”在抗日根据地的广泛实践

夏豪杰

摘要：民国时期，陶行知创立的“小先生制”不仅对教育普及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抗日根据地得到了广泛实践。根据地政府将“小先生制”写入相关教育政策中，倡导践行“小先生制”，在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活动中实施“小先生制”。广泛推行的“小先生制”在推进根据地普及识字教育、发展社会教育和支援抗日战争等方面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关键词：“小先生制”；识字教育；社会教育；抗日战争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6660(2025)03-0053-08

“小先生制”作为“中国土壤中生长出的本土教育理论和教育方法”^①，是民国时期陶行知创立的一种推行教育普及的有效教学方法和组织方式。“小先生制”始于1923年陶行知开展平民教育运动时采用的“连环教学法”。1932年，陶行知在江苏省宝山县（今上海市宝山区）创办工学团，将“小先生制”作为主要的教学组织方式。1934年1月28日，儿童自动工学团小先生普及教育队授旗典礼及宣誓仪式的举办，标志着“小先生制”正式形成。到1934年底，“小先生制”已在全国22个省市的53个教育机构实施^②，并引发了教育界的广泛关注与讨论。1935年1月出版的《中华教育界》第22卷第7期是“普及教育专号”，开设了“小先生普及教育运动实例”专栏，介绍了江苏宜兴西桥、江苏无锡河埭口、江苏南京晓庄、上海俞塘实验区、广东百侯小学、山西舜帝庙、河北定县等学校和地区的“小先生制”实施情况，展示了“小先生制”对普及教育的实际效果。编者按称：“中国以民间教育者之身份，于普及教育有所呼号与设计者，自袁观澜先生故后，沉寂已久。近者陶行知先生，本其生活教育学说之体系，谋以儿童对于教学做之潜蕴力，推动普及教育。此制实有展开推广之可能。”^③此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小先生制”也开始实践。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小先生制”在抗日根据地得到广泛推行，解决了根据地教育发展中的不少难题，有效地推动了根据地教育建设。

基金项目：2024年河南兴文化工程文化研究专项项目“重构与开拓：民国时期河南乡村教育转型”（2024XWH118）。

作者简介：夏豪杰，河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校聘副教授，教育学博士。

① 刘霞：《“小先生制”：话语生成、理论体系与时代展望——纪念陶行知创建“小先生制”100周年》，《教育史研究》2023年第3期。

② 《全国小先生普及教育表》，《生活教育》第2卷第1期，1935年。

③ 《小先生普及教育运动实例》，《中华教育界》第22卷第7期，1935年。

一、“小先生制”在抗日根据地实施的现实基础

“小先生制”有利于普及教育工作的开展，能适应抗日战争和抗日根据地建设的现实需求，是“小先生制”在抗日根据地推行的现实基础。

（一）抗日根据地认可并推崇“小先生制”

“小先生制”是陶行知基于中国教育实际创设的一种教育普及方式，集中体现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教育理念，与中国共产党倡导的理论与实践结合、密切联系群众等主张契合。毛泽东认为陶行知的教育理念与方法（包括“小先生制”）与马克思主义教育理念具有内在一致性。1939年8月29日，毛泽东指出：“在抗战教育中，知行合一是一件大事。陶行知主张知行合一，提倡生活教育，把教的、学的、做的统一起来，这在马克思主义说来，就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①

徐特立也高度赞扬了“小先生制”。他说：“陶行知的‘小先生制’，我在江西所行的与‘小先生制’密合，但我只有行动没有理论。他发明了理论，他实际上比我高明，我不是他的学生，但我常尊敬他为师，我与故旧通信，暑假名常署‘师陶’。”^②1942年，他还提出：“生活教育和‘小先生制’，是实际的，同时又是革命的。”^③他号召学习这种实践精神和革命精神，让其与边区的教育工作有机结合。1942年2月27日，李维汉在延安中央研究院中国教育研究室举行的陶行知教育思想讨论会上作总结发言。他强调“小先生制”是“适用于普及教育和大众教育的方法，在我们这里也可以灵活地运用它们”。^④可见，“小先生制”蕴含的教育理念被抗日根据地认可和推崇，也丰富了抗日根据地的教育理论建设。

（二）“小先生制”能适应抗日战争实际需要

抗日战争期间，根据地的所有活动都以服务抗战为中心，适应抗日战争的实际需要也是开展教育活动的重要考量。尤其是在敌后抗日根据地，教育必须采取灵活多样的方法来适应游击战争。不少游击区就实行“敌来停课，敌走上课”的教学方式；校舍烧了，就实行“露天教学”。有些地方，实行“洞口教学”，在有洞的屋里上课，一遇敌情，就钻进洞里。^⑤

“小先生制”以其灵活的特点，适应了抗日战争中的教育环境。1942年5月，日本侵略军在冀中进行“五一一大扫荡”，冀中区在游击区实行导生制（即“小先生制”），分散进行间接教学，部分村庄则利用地道坚持秘密小组的直接教学。^⑥1944年，晋察冀根据地总结冬学经验时指出，游击区可以培养“小先生”，采取“零整批发”的教学方式，召集“小先生”上准备课，再到组里教会其他儿童；还要注意提高对敌的警觉性，隐蔽课堂，敌人来村时师生迅速转移，避免损失。^⑦可见，在抗日根据地，实施“小先生制”可以在进行抗日斗争的同时推进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三—一九四九）》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37页。

② 徐特立：《再论我们怎样学习》，《新华日报》1942年4月25日。

③ 湖南省长沙师范学校编：《徐特立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61页。

④ 方明主编：《陶行知全集》第12卷，四川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680页。

⑤ 教育科学研究所筹备处编：《老解放区教育资料选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年版，第57页。

⑥ 姚宏杰、宋荐戈主编：《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事日志》，山东教育出版社2020年版，第395页。

⑦ 边委会教育处：《一九四四年冬学运动简要总结（续完）》，《晋察冀日报》1945年11月28日。

教育教学工作,把传播知识、启发民众、服务抗战等多种任务结合起来。因此,在许多抗日根据地,“小先生制”得到了社会的充分认可,在华北敌后根据地,做小先生甚至成为“儿童中的一种流行的风气”。^①

(三)“小先生制”能解决根据地教育发展的难题

抗日根据地教育基础薄弱,教育普及任务繁重,而师资又异常紧缺。如陕甘宁边区“一般的县份,一百人中难找到两个识字的,有些县份(如华池、盐池等)两百人中间只能找到一个识字的”。^②李维汉指出,陕甘宁边区“知识分子缺乏,文盲高达99%;学校教育,除城镇外,在分散的农村,方圆几十里找不到一所学校,穷人子弟入学无门”。^③晋察冀边区,文盲占90%以上。^④晋冀鲁豫边区的武安、黎城、涉县、左权等县文化教育极不发达,冀中北部、冀西山地、晋东北以及雁北的广大农村,学校很少,即便号称教育发达之区的京汉铁路沿线,入学儿童也仅占学龄儿童的30%,其他大部分地区还不及20%。在阜平、灵丘、黎城、武安等县的荒僻山沟里,甚至一连几个村庄没有一个识字的人,写一张文契、一封书信,要跑到一二十里外去求人。^⑤《解放日报》社论还指出:“我们要推行识字教育,但是我们找不到教人识字的先生。”^⑥在敌后抗日根据地,面对教育普及任务异常艰巨、师资力量非常匮乏的现实困难,“小先生制”成为完成教育普及任务的及时雨。

“小先生制”采用“会的教人,不会的跟人学”“即知即传”“送教上门”等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让学习成绩较好的小先生辅导其他学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学校师资严重不足的困难;让有一定文化程度的小先生领导冬学、识字组,充当教育普及的先锋和主力,使识字教育的师资力量大为增强,有效扩大了教育普及的范围。曾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社会教育科科长的吕良就倡导采用“小先生”“大先生”和流动教学的办法开展社会教育。^⑦可以说,在文化落后、文盲遍野又十分贫困的旧中国,“小先生制”作为一种万般无奈的自救方法^⑧,解决了抗日根据地的教育难题,对于推动抗日根据地教育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小先生制”在抗日根据地的具体实践

“小先生制”在抗日根据地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抗日战争期间,各根据地教育活动的开展在不同程度上运用了“小先生制”,不仅制定了明确的“小先生制”相关制度,还在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中都开展了“小先生制”实践。

(一)教育政策中的“小先生制”规约

在全民族抗日战争打响之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已开始推行“小先生制”。1936年12月13日,共青团中央同西北办事处教育部联合发布的开展冬学的指示指出,要建立“小

① 进文:《孩子们都想当小先生》,《新华日报》1943年11月11日。

② 《陕甘宁边区小学教育概况》上,《新华日报》1944年6月3日。

③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566页。

④ 仓夷:《晋察冀边区的识字运动》,《新华日报》1940年7月2日。

⑤ 刘松涛:《华北抗日根据地农民教育工作的几点经验》,《人民教育》1952年第7期。

⑥ 叶美兰等著:《中华民国专题史(第7卷):中共农村道路探索》,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82页。

⑦ 吕良:《边区的社会教育》,《战时教育》第2卷第9期,1938年。

⑧ 金林祥主编:《二十世纪陶行知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9页。

先生制”，以助力冬学和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推广。1937年是苏区“普及教育突出年”，实行“小先生制”，随学随教，加快教育普及。^①

全民族抗战期间，许多抗日根据地“小先生制”作为发展教育事业的手段，并将其写入教育政策。1938年9月，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发布的《“小先生制”教育实施办法》指出，“小先生制”是小学生教育一般民众的教育方法，先由教师选择三年级以上学生予以服务训练，培养其服务的中心信仰，把握“即知即传”信念，由小学生去办传习处，使不能接受教育的大众得到教育机会。^②1938年陕甘宁边区制定的《国防教育的方针与实施办法》、1940年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开展抗日民主地区的国民教育的指示》、1940年陕甘宁边区政府起草的《边区教育宗旨和实施原则（草案）》均明确肯定了“小先生制”的价值，要求实行该种制度。^③1941年2月10日，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制订了《1941度文教宣传工作计划大纲》，要求在文化宣传教育中普遍推行“小先生制”。^④1941年3月，中共淮南津浦路东省委发出的《为开展党的宣传教育工作而奋斗》提出，在各乡各保的小学校中，广泛实施“小先生制”，鼓励小学生中的优秀分子成为小先生，参与民众学校、夜校、识字班、民众文化俱乐部等文化教育活动，小学教员则要负责指导小先生。^⑤1945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三十四年冬学的指示》强调，冬学的组织形式要以不误工、不误活、不误时为重要原则，可以采取家庭识字、捎条子、小先生等多种形式。^⑥可见，抗日战争期间，“小先生制”为各根据地政府所重视，成为根据地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重要开展方式。

（二）学校教育中的“小先生制”实践

“小先生制”作为一种有效的教学方式与管理方式，成为抗日根据地不少学校提升教学质量的重要手段。一方面，抗日根据地部分学校的教学实行“小先生制”，让学习成绩好的学生帮助学习成绩差的学生，或让高年级的学生辅导低年级的学生，把小先生作为教师的好助手。陕甘宁边区杨家湾村的北郊乡小学教员陶端予采用“小先生制”，让“娃娃带娃娃”——成绩好的学生帮助教师教育其他学生^⑦，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1944年7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办公厅专门撰写了《记杨家湾村的北郊乡小学》一文，宣传陶端予的办学经验。1945年，毛泽东接见了陶端予，还评价说：“杨家湾的道路是正确的，经验很好。”^⑧晋察冀边区蠡县也运用了“小先生制”，面对日军“扫荡”时，学校就化整为零，一面坚持游击战，一面采用“小先生制”的办法坚持学习。^⑨可见，抗日根据地的不少学校都采用了“小先生制”，有效地保障了学校教学活动的开展和教学效率的提升。

另一方面，抗日根据地还将“小先生制”作为学生管理的有效方式，建立了小先生队、儿

① 陈桂生著：《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95—196页。

② 刘英杰主编：《中国教育大事典：1840—1949》，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47页。

③ 章开沅、唐文权著：《平凡的神圣——陶行知》，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336页。

④ 马钊主编，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山东省志（68）：教育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53页。

⑤ 姚宏杰、宋荐戈主编：《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事日志》，山东教育出版社2020年版，第342页。

⑥ 教育阵地社编：《根据地普通教育的改革问题》，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1946年版，第43页。

⑦ 罗烽：《模范教师陶端予（续昨）》，《新华日报》1945年4月25日。

⑧ 《陶端予纪念集》编辑组编：《陶端予纪念集》，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8页。

⑨ 宋荐戈、张腾霄著：《简明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295页。

童生活团等学生管理组织。1942年11月15日,苏中行署发布《中小学校组织冬学工作队、小先生队暂行办法》,规定各公私立小学应训练小先生若干人,成立小先生队,由学校教师领导,以高度的积极性参与冬学运动。^①察哈尔的怀安县普遍实行“小先生制”,该县176所农村小学,全部由小先生协助教员进行教学和生活辅导。该县还有60多所民校由小先生授课。^②杨家湾小学采用“小先生制”,让学生管理学生,效果显著,教员去开会的半个月期间,“娃娃们能做到自动到学校去学习,照旧检查卫生,记日记,学写信,大娃娃还教了小娃娃,一次架都没有打”^③。

(三) 社会教育中的“小先生制”实践

“小先生是普及教育顶有效的方法,各地都要尽量发动小学生来做小先生”。^④在抗日根据地,“小先生制”被认为是推进教育普及非常有效的方式,小先生领导的识字组、识字班、冬学等社会教育机构对于教育的普及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一,小先生是识字组、识字班的领导者。抗日根据地师资缺乏,社会教育领导力量严重不足。各地政府工作人员、小学教师成为社会教育的主要推动力量。为有效解决师资不足的难题,抗日根据地让小先生成为其中重要的领导者。1938年7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出指示信,提出各县暑假期间的识字小组、夜校可由小先生来领导。^⑤子洲县的冬学“采取‘小先生制’,先教组长再教学员,学员们各人做了沙盘,订了识字本,刷了黑板,组与组、个人与个人之间,订立了各种学习、生产竞赛条约。”^⑥群众学习氛围浓厚,识字学习效率提高了。还有一些小学生做小先生,自己办识字组,教家人或其他失学的儿童识字。如绥德的刘佩珍就办了识字班,教会了附近一些女娃娃和调皮的儿童识字。^⑦

第二,小先生是冬学师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冬学是抗日根据地社会教育的重要形式。为了提升冬学的实施效果,抗日根据地重视采取灵活多样的组织方式,其中“小先生制”也是重要的一种。各地积极引导学习成绩较好的小学生当小先生,做冬学教师,有力充实了冬学师资队伍。1941年10月10日,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文教处召开冬学运动座谈会,省战工会文教委员会副主任李竹如在会上做了《怎样开展今年冬学运动》总结报告,指出“小先生制”是冬学的重要组织形式。^⑧据统计,1942年山东省冬学至少有5889处,学员1297688人。面对大规模的学员,如果没有小先生的参与,社会教育工作是难以开展的。^⑨1944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出冬学工作补充指示》强调冬学的学习组织要灵活,可以采用“民教民”“小先

① 皇甫束玉、宋荐戈、龚守静编:《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纪事(1927.8—1949.9)》,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35页。

② 《察哈尔怀安县实行“小先生制”》,《新华日报》1946年8月12日。

③ 《陶端予的教学方法》,《新华日报》1945年4月22日。

④ 吕良:《社会教育工作纲要》,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编:《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社会教育部分》上,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4页。

⑤ 姚宏杰、宋荐戈主编:《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事日志》,山东教育出版社2020年版,第242页。

⑥ 教育科学研究所筹备处编:《老解放区教育资料选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年版,第222页。

⑦ 《边区妇女在文教运动中》,《新华日报》1945年1月14日。

⑧ 姚宏杰、宋荐戈主编:《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事日志》,山东教育出版社2020年版,第364页。

⑨ 李向群:《山东解放区的教育事业》,《新华日报》1944年11月13日。

生”“个别教学”、分组与集体教学的配合等方式^①，充分适应群众的需要。在晋察冀边区，小学校里较优秀的小学生，大都是小先生，教冬学的学员识字、唱歌。^②

为了充分发挥小先生在社会教育中的作用，抗日根据地还要求训练小先生，以提升小先生的工作能力。1938年6月1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发出的《关于社会教育工作问题的指示信》要求发动小学生做小先生，教人识字，每个小学校至少训练两个小先生。^③1939年9月11日，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发布的《边区社会教育实施办法》提出，各级军政民机关团体工作人员推动或担负驻在地的社会教育、成人教育时也要充分用好“小先生制”，办传习处。^④还有些根据地建立了“小先生制”实施体系，充分发挥了小先生在社会教育中的作用。在晋察冀边区，学校教师创办了传习处，由三年级以上的学生充当小先生，按照“即知即传”的理念，开展传习教学，招收附近的不识字者学习。冀西的农村普遍设立传习处，每在午饭以后或黄昏时分，常常有四五个或八九个农夫蹲在树林下或屋檐下，听小先生教唱歌或识字。^⑤

三、“小先生制”在抗日根据地实施的效果

在抗日根据地，“小先生制”全面融入了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具体实践，在促进根据地教育普及的过程中，还充分服务了根据地的各项建设，有力地支持了抗日救亡运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一）推动识字教育的普及

抗日根据地实施“小先生制”多是引导学生充当小先生。在学校内推行，让学习程度高的学生教育和管理其他学生；在社会上推行，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小先生不仅成为家庭识字的推动力量，而且成为识字组、识字班的领导者和冬学的教师，充当推进社会教育的先锋。由此可知，“小先生制”将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融于一体，让小学生成为提升识字率、促进教育普及的关键力量，成为解决教师不足、提升识字效率的有效方法。^⑥

“小先生制”在教育普及过程中，效率较高，对根据地教育普及助力颇大。晋察冀边区阜平县朱家营小学教师李翠珍，充分运用“小先生制”，创办了6个夜间传习班，让小先生去教课，有效地扩大了受教育的范围。^⑦陕北绥德倡导实施“小先生制”，经过一个月的努力，超过700个妇女和儿童参与学习，成绩较好的学员学会了唱49首歌，会写200多个字，最少的也学会10多首歌、50多个字。^⑧其中绥德县的五年级学生刘佩珍领导的识字组，先从家庭出发、从熟人入手，教会了6个女娃娃识字，再走向街头，让有需要者皆可去学，并利用儿童爱玩的心理，发动学员也成为小先生，再教会自己家庭中的不识字者，其中9个学员又教会了17个

① 《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出冬学工作补充指示》，《晋察冀日报》1944年9月1日。

② 仓夷：《晋察冀边区的识字运动》，《新华日报》1940年7月2日。

③ 姚宏杰、宋荐戈主编：《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事日志》，山东教育出版社2020年版，第240页。

④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编著：《中国共产党百年教育大事记（1921—2021）》，教育科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108页。

⑤ 克寒：《模范抗日根据地的晋察冀边区（八续）：崭新的边区教育》，《新华日报》1938年9月3日。

⑥ 中国昌：《抗战时期晋绥根据地冬学运动研究》，《近代史学刊》2011年第8辑。

⑦ 宋荐戈、张腾霄著：《简明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382页。

⑧ 克悠、尹樵：《记绥德市的妇女儿童识字组》，《新华日报》1944年8月27日。

人。^①这种“家庭—街头—家庭”的“小先生制”实践路径，有效地扩大了识字教育的对象，提升了教育普及的效率。

陕甘宁边区将小先生与小学教员、当地的青年干部共同作为推动教育普及的重要力量。如表1所示，1939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制订的《消灭文盲三年计划（草案）》，明确要求通过三年的努力，引导小先生开办12 250个识字组，扫除文盲91 440人，约占扫盲计划总人数的40.60%。

表1 陕甘宁边区消灭文盲三年计划

时间	小先生领导		当地干部领导	
	识字组数（个）	扫盲人数（个）	识字组数（个）	扫盲人数（个）
1940年秋—1941年夏	2 650	18 540	4 000	20 000
1941年秋—1942年夏	3 900	27 300	6 500	59 800
1942年秋—1943年夏	5 700	45 600	9 000	54 000
合计	12 250	91 440	19 500	133 800

资料来源：叶美兰等著的《中华民国专题史（第7卷）：中共农村道路探索》，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72—573页。

（二）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小先生推动教育普及，可以在家庭生活与社会生产中进行，不仅不耽误生活与生产，而且通过教育普及与民众知识力的提升，助力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小先生制”是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典型范例，可以让不识字者在生产活动中接受识字教育，做到生产与学习两不误。一些小先生到失学儿童放牛、砍柴的山上，送教上门。小先生和失学儿童一边参加生产，一边识字，效果很好。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夏陶然采用“小先生制”，创办了使学习、生产两不误的“牧场教育”，30多个男孩子和八九个女孩子都参加了学习。^②

小先生在识字教育的过程中，宣传清洁卫生、妇女纺织、劳动生产，带领家庭妇女边劳作边学习，注意家庭卫生、热爱劳动；还引导民众主动打败困扰他们的贫穷、愚昧等问题，实现生产的发展。绥德的小先生雷淑云在家庭妇女纺线、做饭、推磨的间隙，教会她们“纺、车、线、米、豆、碗、筷”等字；雷坤元在教妇女识字的同时，还教育她们讲卫生、重生产，让妇女和儿童树立“自己劳动卖下钱，就能顾家常零用”等热爱劳动的观念。^③还有的小先生帮助政府宣传“实行农业累进税，自卫备荒，发展生产，拥军、拥政、爱民等政策法规”^④，有力地支持了根据地的经济建设。

（三）支援抗日战争

“小先生制”与抗日战争充分结合，不仅通过教育宣传等方式间接支援抗战，而且小先生还参加站岗放哨等工作，成为保卫根据地的重要力量，有力地支援了抗战。

① 《识字班怎样办起来的——介绍解放区的一个例子》，《新华日报》1946年6月22日。

② “人民教育”社编：《老解放区教育工作经验片断》第二辑，上海教育出版社1959年版，第109—117页。

③ 克悠、尹樵：《记绥德市的妇女儿童识字组》，《新华日报》1944年8月27日。

④ 《陕甘宁边区的小学教育（下）》，《新华日报》1944年6月4日。

一方面，根据地引导小先生在群众教育中强化抗日宣传教育。扫除文盲，提升民众的文化素养，是支援抗战的重要手段。在华北敌后抗战根据地，做小先生成为小学生中的时髦活动，小先生坚持“要长期打日本鬼子，就得先扫除家庭的文盲”^①的工作理念，认真开展扫盲教育，服务抗战大局。同时，抗日宣传是根据地小先生教育活动的重要内容。小先生不仅教识字，还教政治和军事知识，讲解国家大事，将在学校中学习的抗战知识向家庭亲友宣传^②，对于营造全民抗战的良好氛围助益颇丰。另一方面，小先生参与抗日活动，有力地保卫抗日根据地。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小先生“学地雷、熬硝”^③，数以千计的小先生在村口、关键路口站岗、放哨、查路条，有效地阻止了敌人的渗透。正如时人所说：“小先生像水银珠一样，无孔不入地淋在敌后每一个角落上。”^④

（责任编辑：杨 燕）

Widespread Practice of the “Little Teacher System” in Base Areas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Xia Haojie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the “little teacher system” established by Tao Xingzhi played an effective role in popularizing education and has been widely practiced in revolutionary base areas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The government in the areas has incorporated the system into relevant educational policies, advocated its practice, and implemented it in school and social educational activities. The widespread implementation of the system has had a positive impact on promoting literacy education, developing social education and supporting the war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in the base areas,

Key words: the “little teacher system”; literacy education; social education;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① 进文：《孩子们都想当小先生》，《新华日报》1943年11月11日。

② 《小学教师应该怎样干》，《新华日报》1938年3月2日。

③ 方明主编：《陶行知全集》第12卷，四川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521页。

④ 进文：《孩子们都想当小先生》，《新华日报》1943年11月11日。